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马克思关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重要论断。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理论、群众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实践指导意义。新时代新征程上，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社会思潮多元交融，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理论能否深入群众并转化为现实力量，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全面准确理解这一重要论断，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凝聚力量，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意义重大而深远。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基本意涵

深刻理解“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一经典论断，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之中。在当时的德国，思辨哲学体系仍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思辨哲学家们将宇宙万物与人类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外化、扬弃与复归，把理想中的彼岸世界视为现实世界的本质，却置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活于不顾。与此同时，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理论批判虽然激烈，却始终停留在宗教和观念的层面，未能触及现实的社会结构与物质利益关系。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文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的这一论断，突出了“现实的人”的实践主体地位，深刻揭示了“理论经由群众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内在机制，有力批判了将理论视为自足观念的唯心主义倾向，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与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物质利益难题”的出现让马克思深刻意识到，国家与法并非黑格尔所许诺的普遍理性的化身，抽象的理性、道德与正义也处处被现实的物质利益所操纵和支配。这种“应然”与“实然”的剧烈冲突，从根本上表明，思辨哲学那种试图仅凭思想批判来改造现实的信念已无法维系。通过系统反思思辨哲学的根本局限，马克思提出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这对经典范畴，并初步阐明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所谓“批判的武器”，指的是理论批判与思想斗争；而“武器的批判”，则指向以革命实践为核心的物质性行动。马克思明确断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一判断蕴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层次。第一，理论无论多么科学、严谨

如何理解“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思想

通信

提问：刘军伟 河南省许昌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

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请问，如何理解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解读：王虎学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副主任、教授

或富有感召力，其本质上仍属于思想观念的存在，无法替代实践本身对物质世界的直接改变。第二，实践活动作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构成了摧毁旧世界、构建新秩序的根本途径。由此，马克思将实践，尤其是革命斗争实践，确立为改变现实的根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在实践面前毫无作为。马克思认为，理论虽然不能代替实践，却能够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从而指导实践、推动实践。正是在这一论证脉络中，马克思作出了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论断：“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本身属于精神性的观念存在，无法直接作用于物质世界，但理论一旦被群众所认同、所掌握，就不再是停留在书本或头脑中的抽象理念，而是能够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现实行动。

理论来源于实践，还需回到实践中去。理论若不能转化为群众的认识与行动，便只能停留在抽象思辨的领域；理论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化成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根本目的。具体来说，理论为群众提供符合时代水平的世界图景、科学的思维方式以及具有时代内涵的价值规范，群众一旦将其内化为自身认知框架、思维方法及价值追求，便能在实践中自觉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而使精神力量真正转化为物质力量。在这一意义上，理论不再只是“批判的武器”，而是经由群众而获得了“武器的批判”所特有的物质力量。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思想的力量既体现在解释世界上，也体现在改变世界上。要想革命与实践取得成功，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与实践作为“武器的批判”

都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尽管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尚未形成完全成熟的、科学的实践观，但他关于理论与群众、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经典表述，已然指明了从“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的根本途径。

中国共产党践行“理论经由群众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实践逻辑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理论思维之于民族进步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马克思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就是理论不断掌握群众、持续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将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作为推进理论创新和改革实践的不竭源泉，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一次又一次地转化为改造中国的磅礴物质力量。

回顾党的早期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体现为先进知识分子的理论自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立者经过亲身实践、反复探索、深入比较，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理论要掌握群众，就不能只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手中，必须走向广大工农群众。大革命时期，党通过工

人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形式，用通俗语言向工农群众阐释剥削根源与解放路径，使革命理论深入人心。土地革命中，“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将抽象理论转化为亿万农民最切身的利益诉求与革命动力。延安时期，党通过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经由群众路线的方法，转化为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的磅礴伟力。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提出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让哲学理论从书斋走向群众。对此，毛泽东曾号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依靠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改造，掀起工业化建设高潮。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曲折，但我们党始终没有放弃依靠群众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向，并在探索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这一时期，真理的力量表现为党领导群众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改革开放后，党的理论创新再次展现出掌握群众、推动发展的巨大能量。经过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我们党坚持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汲取智慧，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根本上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时代课题。通过大规模的学习、宣讲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党的先进理论内化为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自觉追求，中国由此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连续高速增长奇迹。这充分证明，科

学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便能迸发出强大的物质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一伟大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

回望百余年历程，中国共产党践行“理论经由群众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实践逻辑清晰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及其历史性成就生动昭示了，真理的力量归根到底来自人民，理论只有彻底地掌握群众，才能转化为强大的历史伟力。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使科学理论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释放出更加磅礴的真理力量。

推动理论更深入、更广泛地掌握群众的重要要求

毛泽东强调，“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中国共产党历来尊重

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人民群众及其实践过程中汲取力量智慧，重视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与利益关切，推动科学理论为群众所理解、认同并践行，不断在伟大斗争中锻造和检验理论与群众结合的实际成效。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理论更深入、更广泛地掌握群众，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几个重要要求。

不断追求和保持理论本身的彻底性。“彻底”的关键在于深刻把握“事物的根本”，同时要求理论具备自我革新的能力。“事物的根本”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实践发展和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实践每前进一步，理论的彻底性就要跟进一步。因此，要有理论创新的勇气，深刻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等根本问题，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回应人民群众普遍关切，始终保持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与引领力。唯有如此，理论才能具备征服人心的真理力量，获得持续的生命力，真正把握住“事物的根本”，从而说服人、掌握人、引领人。

理论必须扎根于人民群众及其实践。理论贴近群众，才能更好掌握群众。一方面，人民群众身处实践第一线，对实践变化感知最为敏感、感受最为深切，也最为聪慧。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要将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作为推动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不竭源泉，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新认识、作出新概括、形成新成果。另一方面，坚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理论传播。要善于运用现代数字技术，采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形式，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活内容，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使群众在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中自觉接受理论。

理论必须引领并解决现实问题。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理论不能停留于思辨的王国，必须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发挥作用。实践成效，是理论掌握群众的最终检验标准。新征程上，要坚持将理论指导落实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完善社会治理等具体实践中，聚焦发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突出问题，通过办好民生实事、破解改革难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理论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唯有如此，理论才能真正成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完成从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现实转化。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发展亦永无止境。新时代新征程，尤其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始终坚持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持续推动理论掌握群众并转化为物质力量，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进而指引并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思想动能、凝聚气势磅礴的群众伟力。

（上接1版）经济文化化是文化价值在各经济领域的转化应用，将文化作为一种经济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通过植入文化元素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品牌竞争力，通过挖掘文化内涵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无论是文化创意赋能制造业设计创新，还是文化体验带动现代服务业品质提升，都是经济文化化的生动体现。

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其本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交流、融合发展，彰显的是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具有的独特作用。一是价值引领力。地方特色文化通过塑造社会共识，将个体价值追求与国家和地区发展目标相统一，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和政策执行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理念，为现代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坐标和道德规范。二是要素激活力。地方特色文化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创造，通过现代生产方式激活文化资源的内在价值，实现经济效益与人文效益的统一。历史文化遗迹、传统技艺、民俗风情等文化资源，经由创意转化和市场化运作，成为带动就业、促进增收、繁荣地方的重要资本。三是产业提升力。地方特色文化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重塑了产业形态，推动产业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文旅融合带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发展，“文化+农业”催生农文旅融合新

业态，“文化+制造”提升产品文化内涵和品牌溢价，共同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四是精神构建力。各地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文明新风培育，推进移风易俗。人们在参与文化传承和创新活动中，极大增强了文化自信自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

深度挖掘贵州特色文化资源的独特优势和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育人”。

贵州是古人类发祥地之一，早在30多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黔西观音洞文化被誉为贵州“史前文化的第一乐章”，是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典型代表，与北京周口店史前文化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南北两大代表。各族群众在贵州这片土地上耕耘生活，留下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阳明心学，是中华思想史的高峰时刻；屯堡文化，是明代汉文化的活化石；村超村BA，成为

群众文化自组织的中国样本。特别是近年来贵州大力实施的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工程、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工程“四大文化工程”，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以不同方式彰显着地方特色文化的突出特性。

红色文化是鲜明底色。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伟大的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始终是“多彩贵州”最鲜明的底色。

民族文化是美丽名片。贵州是多民族和谐共生的聚居地，素有“文化千岛”的美誉。多样的民族文化在贵州这片大地上相互交织，既是各民族的智慧结晶，也生动诠释了各民族在贵州逐步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开放性、包容性。

阳明文化是重要标识。贵州是阳明心学的诞生地。全省现存王阳明相关遗址遗迹18处，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财富，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推进修好共产党人“心学”、助力培育良好社会心态、开展中外哲学对话提供了有力支撑。“知行合一”已经成为彰显贵州人文精神的特色文化名片。

屯堡文化是活态遗存。起于秦汉筑长城、置屯戍，延至明代北修长城、南置屯堡的军事防御与边疆经略

举措，留下了“北有万里长城、南有千里屯堡”两大文化奇迹。明代在贵州境内置29卫、127所、2000余个屯堡，大量屯堡村寨得以集中、完好保留，其地戏、服饰、语言、建筑至今活态传承，为研究明代汉文化提供了“活化石”，也为文旅融合提供了资源。

此外，贵州还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最多的省份之一，多样的自然生态和遵循敬畏自然的生活习俗深度融合，催生了智慧多元的生态文化。这些丰富多彩的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既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要素，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深入拓展地方特色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贵州实践

发挥地方特色文化优势、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既是战略方向问题，更是路径方法问题；既是理论课题，更是实践命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论述，必须将文化生产力的价值引领力、要素激活力、产业提升力、精神构建力，深度融入产业升级、提振消费、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全过程，让地方特色文化成为新时代最持久的竞争力。

以文化科技赋能产业深度融合。科技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支撑。通

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打破文化传播的壁垒，拓展文化赋能的边界。近年来，贵州发挥红色资源与数字资源整合优势，打造了全国首个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浸式数字体验馆“红飘带”，以人工智能、全息影像、全维度机械联动等数字科技手段全方位展示长征文化，推动沉浸式红色文化旅游业态升级。同时，贵州建成“渲染超算中心贵阳算力节点”一期项目，已为150余部影视作品渲染提供算力支撑。要进一步强化技术赋能、完善制度保障、激发主体活力，推进文化和科技跨界融合，通过产业链重构与生态培育，催生文化新业态，重塑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

以文化供给赋能扩大消费需求。当前，文化消费正日益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力。贵州大力实施“四大文化工程”，全力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文化消费持续增长，已经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2025年，贵州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9%、11.1%，省外、入境游客同比分别增长15.3%、50.1%。要积极应对消费新形势新趋势，深度挖掘文化资源内涵，加强民族村寨、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红色旧址等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利用，拓展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提供更高品质、更加丰富、更多创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

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

以文明新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文明新风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灵犀纽带。近年来，贵州“村超”“村BA”“村马”“村T”“村舞”“村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以其蓬勃生机和独特魅力引发广泛关注。这些“村字号”活动反映的是向上向善向美的文明乡风，呈现的是贵州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生动图景，展示的是幸福中国、文明中国、美丽中国的良好形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要大力弘扬尊老爱幼、邻里互助、勤俭节约、诚实守信等美德，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彰显文化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以文化认同赋能社会和谐稳定。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既需要刚性的制度保障，更需要柔性的文化滋养。贵州在基层治理中创新民歌普法、寨老议事会、民情调解室等载体，有效促进了乡村社区和谐稳定。贵州省政协创新开展“院坝协商”“社区协商”等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助推普法宣传教育、规范村民规约、化解矛盾纠纷。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价值引领、道德教化方面的独特作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弘扬良法善治，增强治理主体的文化认同，达到以文化人、成风易俗的良好治理效果，形成群策群力的浓厚氛围，推动源头治理和系统治理的综合性效能提升，促进民族和睦、宗教和睦、社会和谐。